

(一)1939 年

小 引

对 1939 年部分交代几句。

本册中所记的第一年是 1939 年。这一年我只有五个多月在延安。5 月以前我还在广东。而且初到延安，特别需要记的事情也不多。即便为了同第二册衔接，多写了一节 1939 年 5 月从广东韶关到延安路上的情况，也只写了六节。

39·01 从广东省委机关到延安的途中

1939 年 2 月我从翁源到了韶关，那时广东省委机关设在韶关。我去韶关是奉省委之命，到了之后我参加广东省青委的工作。在韶关工作了不到三个月，5 月省委接到延安中央青委和中央组织部的电

报 要我去延安。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 而我们这样的共产党员把延安看作是自己的家 去延安 就有回家的心情。尽管我对在广东省开展工作有很高的热情，想在广东省把自己的根扎下去，愿意看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广东省的革命力量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时候广州已经沦陷 我们党要做的工作 就是开展广东的游击战争 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建立根据地 从游击战再发展到运动战 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这一套我记得很熟。我愿意在广东省的武装斗争中锻炼自己，显显身手。但是延安在召唤我，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准备出发了。

这次去延安是我一个人走的。走的路线也很简单，从韶关坐火车到衡阳 转湘桂铁路到桂林 去找八路军办事处 接上党的关系 以后的路程就用不着我自己操心 听从安排就是了。从韶关到桂林不过两天的时间，也是很简单的行程。于是就在 5月初的一天，与广东省委和在韶关的青抗先总队部的同志告别后 我上路了。

在衡阳我没有去找什么人 稍事休息就西去桂林 到桂林后顺利地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桂林是我去延安的第一站。

桂林当时的气氛与广东很不相同。战火一时还没有烧到这里 政治环境也还算可以 所以文化界、新闻界的人就集中在这里。有从武汉来的、有从广州来的、有从长沙来的 还有从上海、香港来的……气氛比较热闹 比较活跃。我的熟人也不少。黎澍那时就在“国新社”我和他在长沙《观察日报》一别 在这里重逢 很是高兴。除“国新社”外，《救亡日报》在桂

林发行 这张由郭沫若创刊的报纸 影响很大。除了这两家新闻单位外，还有一个“青年记者协会”，范长江在那里负责。我和范长江初次见面就是这一次在桂林。1938年在广州当时的军事形势下，几乎谈不到任何文化工作。后来我又到了粤北乡下有半年之久，别说大的城市，连县城也没有到过。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了。

现在到了桂林，别有一番感受。听听朋友的高谈阔论和来自四方的消息，日子过得很快。

在桂林我住在湖滨的一所房子里，是朋友们为我安排的，这所房子似乎就是青年记者协会的。

到桂林后，我的中心任务就是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北上的问题 在八路军办事处 我见到了叶剑英将军。我曾经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过他。他告诉我 他不久就要去重庆 可以把我先带去重庆 要我在桂林等着 由于出发时间不一定 嘱我不要离开桂林，免得找不到我。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在桂林不动。“桂林山水甲天下”，5月是特别好的季节，但这一次我一个风景点都没有去。“阳朔山水甲桂林”我知道乔冠华这时在阳朔。乔是民先队柏林队部的，1938年回国后，我们在武汉和广州都有过接触。本来可以看看他 顺便看看‘甲桂林’的阳朔风光 可那时我一点闲情逸致也没有，就在住所等八路军办事处的通知。

在桂林有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这件小事后来产生了一个结果 以至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到它 而且多次提到它。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桂林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日记本 是三十

六开本的二百多页是白报纸的本子。每隔二十来页就夹两页画。这种日记本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时觉得很贵重。当时没有用，一直带到延安。后来它被我派了一个比较值得回忆的用场，这个以后我再写。

我在桂林呆了好几天，有一天办事处终于告诉我可以向重庆出发了。办事处为叶剑英同志弄了一辆载重卡车，从桂林去重庆的几个人，都是搭这辆车走的。在出发的那一天我们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他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一群人就坐在卡车的上面。我们都穿着灰色的八路军战士的服装，从来没有当过兵的我，这次是第一次穿军装。

顺便讲讲那次去重庆途中过宜山的情况。从桂林出发，当天就到了柳州。在柳州我们停留了一天，然后前进到宜山。到宜山后我们又停留了一整天。那时候行车的速度是很慢的。

我知道流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我的父亲当时在宜山。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不知怎的遇到了他，把他拉到宜山。我这个同学这时候在国民党军队当汽车队队长，驻扎在宜山以东若干里的一个村庄里。我在宜山有一整天空闲的时间，本来是可以找一下我父亲的。我和父亲分开多年，从感情上说我想见见他。可是我不愿意见我那个在国民党当军官的初中同学，因此只好不见我父亲。在即将离开宜山的时候，才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说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见他了。没有想到汽车开到宜山西边的柳江江畔，有成百辆的汽车在那里排队等着渡轮把它们渡到对岸去。我们的那辆汽车在江边足足排了两天

队，还轮不到让我们这辆卡车过江。而我的那个同学是汽车队队长，非常熟悉江边车子排队的情况，于是坐着汽车一辆一辆地查看，终于找到了我，并把我接到他的驻地见了我父亲。我在汽车连驻地住了一晚，第二天他把我送回江边，又等了一两天才轮到我們过江。

过了宜山的那一条江，走不远就进入贵州省。

贵州穷山恶水、生活贫困我早有所闻。走在贵州境内，对一路的情景进行观察，果真如此。路边的山又大又陡，由于雨水充足，山上有树，可就是没有田地。田地都在坝子——山间的小平原上，贵州这种小平原既小又少。汽车在公路上走，就没有经过这种小平原。那时修筑的公路为了省钱，坡度很大，坐在车上的确有些胆战心惊。有一段公路，司机们把它叫做“掉死岩”，这是谐音，本来还有一个好听一点儿的正式名字，可是被弃之不用。走这段公路，只要司机一不小心，车子就有翻下大山去的危险。我坐在车上，亲眼看到不止一辆掉到山下去的汽车的残骸。路上行人不多，但常常可以看到背着一大块盐块的独行人。一块一般一百公斤左右，背盐人艰难地在坡度很大的公路上行走。这块盐一直不从身上卸下，随身带着一个大架子，实在太累了，就用木架把盐块支起，在路边靠一靠，歇歇背和腿。在路上有时还可以看到卖茶水和卖银耳汤的。茶水当然很便宜，赚不了多少钱。那银耳的确是当地的特产，煮得很好。在大城市银耳是公认的补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在贵州公路旁边它的价钱一点也不贵。干这些营生的人，不管老老少少，个个穿得破烂不堪。“天无三日

晴 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银 ”那是概括贵州当时状况的名言——其实我早已听说过，同我这次亲眼所见完全吻合。

汽车进入贵州 经过独山到了都匀。到都匀后 司机告诉我们 第三天清早离开都匀前往贵阳。这样一个行进安排 对我正合适 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清华同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简称“民先”）队友傅明弟在都匀 我想见见他，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他是个新闻工作者，抗战后在他家乡都匀搞发展民先的工作，同我一直有通信联系。各地民先的地址我都带在身边，按照我身边本子上记下的地址一下子就把他找到了。他告诉我 贵州的政治局势很不好 只能同特别信得过的人一起工作，同一般青年只是交朋友，不敢打出民先的旗号，但他一直在坚持工作。

就是在都匀，他告诉了我贵阳民先队被破坏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这件事我在广东省委已经听说了一些，但没有傅明弟告诉我的详细。贵阳当地人、抗战前在中国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党员、民先队员张益珊 在 1938 年 2 月曾到武汉办事处找到我，告诉我抗战后他回贵阳已经团结了不少革命青年 在贵阳建立民先地方队部的条件已经具备 问我是否同意他把民先地方队部成立起来。我同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回贵阳后他就把贵阳地方队部组织起来了。1995 年 8 月 4 日《贵阳晚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中讲道：“1938 年 4 月 共产党员张益珊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派遣 来到贵阳，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建立了贵阳民先地方队部。”（我可以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他们向贵阳国民党反动当

局要求准许民先队合法 反动当局骗他们把名册交上去 并把人员集合起来批准合法，结果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张益珊和加入民先队的队员全部逮捕，张益珊被杀害。张益珊并不是个很幼稚的人，但还是受了骗。贵阳的国民党因为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更是肆无忌惮地镇压革命 这些反动派不怕社会舆论，野蛮得很。这种情况当时傅明弟基本上都告诉我了。听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而且我反思自己没有更多地警告张益珊要谨慎从事，我觉得我负有某种责任。

从都匀到贵阳只有一天的路程。车子在贵阳停留了两天。由于张益珊组织起来的贵阳地方队部已经被破坏，我也就没有法子同原先贵阳队部的人接触。那时从南京、武汉撤退到贵阳的机关不少。我们的不少同志也暂时在这里栖身，其中包括 1938 年在我主持的民先总队部办事处工作的毛雍如、清华同学民先队员章宏道（也就是后来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那时章宏道和毛雍如在贵阳城南的图云关。毛雍如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章宏道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我去图云关把他们都找到了 知道他们正在考虑自己的去向 多时不见 畅谈了一番。

过了贵阳就到了遵义。那时由反动派统治，遵义会议的旧址 我没有去打听 也没有敢去那里看一看。那时我对党的这段历史并不清楚，只是听到过红军在遵义开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上纠正了红军长征中的某些错误 会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完成了长征。我想听叶剑英同志讲讲遵义会议的情况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晚上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是分散住

的。那天晚上我被分配到一个有钱的人家，在一个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好的帐子里舒舒服服地不受蚊子、臭虫、跳蚤扰乱地睡了一个好觉。而一路上我常常在汽车上面露天过夜，被蚊子咬怕了，对这顶帐子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顶帐子好就好在它不但有顶而且有底，睡觉的时候钻在里面，任何虫子都咬不到自己。1995年8月我写了一篇《贵州的两顶先进的帐子》，把这一顶帐子也写在那篇文章里面。

汽车要经过娄山关。娄山关红军的战争故事大家都听说过，早上车子从遵义出发时就有人提出过娄山关时汽车停下来看看。同车的叶剑英同志亲自指挥过娄山关战斗，大家更希望他做点介绍，叶剑英同志同意了。

到娄山关，汽车在一个立有“娄山关”三个字的路碑处停下来，大家都下了车，在碑前站好。贵州山高，起落也大。娄山关地形的确相当险要。那时的公路质量也差，更增加了险要的感觉。叶剑英同志用手指着近处和远处的山头山谷，绘声绘色地讲了当年娄山关这一仗是怎么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叶剑英同志讲话。以后我见到叶剑英的机会不少，建国以后更是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见到过他，可是听他讲故事只有这一次。

车子到了重庆，同来的人都分散了。我被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安置在化龙桥的一个地方，那房子是南方局或八路军办事处接待过路人员的。

我们住的是平房，靠着马路。房子很简陋，有些像临时工棚。这种建筑物当然不会长期保留。建国后，一次去重庆，我

去化龙桥走了一趟 这个地方成了闹市 路边的房屋全是几层的楼房，同当初留下的印象完全对不上号。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蒋介石加强统治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林立 同时我们党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也在这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也在这里发行。这个城市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两党的斗争很尖锐，也很复杂。我的熟人不少 清华同学蒋南翔、杨述、许立群 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孙少礼、孙幼礼等都在这里。他们有的是做公开工作的，有的是做地下秘密工作的。我在重庆呆的时间不短 要等有合适的、安全的去延安的机会才能离开重庆。

我也不着急去延安，有机会在重庆看看也很难得。我在重庆的活动就是访友。市内各处有朋友的地方都去。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去了不少次。我还去过北碚和柏溪，那是离重庆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郊区。我都是两条腿走着去的。红岩有时我也去 问问去延安的消息。在这个山城 我会友聊天倒不觉得寂寞 不过我并没有参加那儿的活动 我是个过路人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八路军乱跑 出头露面 对在重庆当地工作的同志和我自己的安全都不利。

到重庆听到南方局的同志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后，就告诫自己要特别小心谨慎 特别像杨述、许立群担任当地党的工作 不便同他们有更多的接触 于是定下了一条结识当地一些青年学生的方针。心理学家陈元晖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叫薛尔 在中央大学学习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重庆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我到重庆的时间是6月，还不到最热的季节，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年轻，重庆没有给我留下酷热难耐的回忆。1938年夏天我在武汉，也没有留下酷热的回忆。

我终于从重庆出发了，也是乘坐一辆我们八路军的载重汽车。我还是穿上了灰色的八路军战士的服装。第一站是成都。

从衡阳起，沿途路经的城市我以前都没有去过，成都也是第一次到。

在民先的许多地方队部里，成都队部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队部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党员韩天石在1936年暑假后到了四川。他也是“一二·九”后南下扩大宣传过程中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者，那时民先队还不是全国性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初成立时没有“中华”两个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937年2月初开过民先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成立的。从那时开始，民先总队长便是李昌。韩天石的组织能力很强，成都的民先队的基础主要在四川大学，胡绩伟、熊复等都是成都队部的队员。我在民先总队部工作时，同成都队部、同韩天石通信也比较多。1937年我在保定那两天，韩天石作为全国学生代表之一到那里向前线军队慰问，我曾帮助他，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所以在我到成都后，便同韩天石和一些民先队员会面。我在成都生活了几天，由于在成都我有一些可以深谈的朋友，所以我对四川和成都的政局以及当时我们党和青年工作的状况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同时

天府之国成都的一些景象 成都的小吃——开花豆、豆浆稀饭等，还有成都的茶馆，我都体验了一番。祠堂街车耀先办的“努力餐”我也光顾了一下。

在成都呆的时间不长，过了几天就坐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的军车向西安出发。

离开成都并不等于离开四川 还要过绵阳、梓潼、剑阁、广元才能到陕西。汽车经过剑门关 开上一段栈桥 使我弄明白“明修栈桥 暗度陈仓”这句话里的“栈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栈桥者也 原来是在直立的石壁上凿洞 把木柱子打进去 作为斜的桥桩 上面盖上木板 变成人马可以走的桥。桥下就是万丈深渊 跌下去就粉身碎骨。这次我们去西安 大家不愿坐在汽车上过栈桥，司机也要求减轻车的重量。当汽车在木桥上走时咯吱咯吱地响，真使人惊心动魄。不知道现在汽车还走栈桥不？

剑门关也在四川境内，而且还在广元的南面。到了宁强才进陕西 再向前几十公里 快到勉县 走过这路的同志说到了“定军山”。进陕西后第一晚宿褒城。第二天过昌坝后过庙台子 司机把汽车停下来 让我们观光了留侯祠（留侯就是帮助刘邦取天下的张良）。

过成都后，我就没有朋友可找了。一路上我找人了解情况 目的是想到了延安后 把了解的情况说给中央青委的熟人知道。陕西的情况 自从 1937 年 9 月我离开太原后，本来就不怎么了解（因为按照分工，北方的情况由总队部李昌直接抓）这次也就不再去打问了。因此去延安的这一段路程 我

就像一个旅游者那样，一路欣赏大自然风光和注意名胜古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风光，那些崇山峻岭、那些险要的地势，长期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人看了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西安已经是 1939 年的 6 月底或者 7 月初了。我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一方面让我们休息一下，一方面考虑究竟什么时候出发去延安最好。办事处的同志不让我们到外面乱跑，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但不是限制我们绝对不能出去，所以我还是出去了一下。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就看了看市容，这个许多朝代的都城，果然气势非凡。

没有呆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就告诉我们可以走了，说最近的形势也还可以，前一辆军车已经顺利到了延安，而且返回了西安，我们可以坐这辆车去延安。于是又休息了两天，我们才继续北上。

39·02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延安

许多人误以为青年人到延安去 就是参加革命的开始 或者说到延安去就是参加革命。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人并不是那样。我知道就有不少人——而且不限于年轻人——在抗战以前的土地革命时期 甚至更早在北伐战争时期 就参加革命 以后在白色恐怖下与党失去联系。现在党中央到了延安 只要到了延安 就可以找到党。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自己直接接触的例子。 1938 年初

我在武汉担任民先全国总队部武汉办事处主任时，延安陕北公学民先队部就把1926年在湖北黄冈参加过革命的毛雍如同志介绍到我这里。他去延安就是为了同党取得联系。他到延安后没有直接找到党组织，而是到了党中央办的陕北公学，参加了民先，然后被介绍到我这里。他在我这里工作了不长的时间，还入了党。毛雍如年长我几岁。但在1938年他还很年轻，是个青年人。

我在武汉长江局青委工作的时候，也参与了叶南（国民党元老叶楚伦的儿子，在苏联同蒋经国一同留过学）的“中国救亡协会”的工作。叶南的舅子赵梅生，因为在察北义勇军问题上同张慕陶有牵连，失去了党组织关系，也去延安找关系，没有解决。

去延安的情况多种多样，即便青年人也是如此。

我的情况则是在抗战前参加革命，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几年之后才去延安的。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不过在去延安前的好几年，就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并在抗战爆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1939年到延安，是中央青委和中央组织部把我从广东省委机关调去的。

抗战后我在太原和武汉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动员了不少青年去延安，一方面根据需要常常劝青年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我也从不少延安出来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青年嘴里，听到关于延安的情况。我并没有许多青年所有的对延安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当我们乘坐的几辆卡车开进延安，看到从照片上早就熟悉的宝塔山的时候，我还是很兴奋，

想看一看延安的心情陡然高涨起来了。

明清两朝 凡是设县的地方 在县城附近总要建个宝塔。延安还有一个名字叫肤施（红军就是从国民党的肤施县长那里把人民解放出来的）是陕西北部的一个县 在县城东南山上就有这样的一座宝塔，这一个山头就是有名的延安宝塔山。

延安的名称来自延水。延水主流从安塞北来，水源还在安塞以北，在宝塔山与一股小支流汇合东去入黄河。走近了宝塔山 到了延水主流向东转弯的拐角处 我就看见了左首的延安城。

我事先已经知道在日机的大轰炸过后，城内已经不再是当地的中心了，机关也都搬到离城比较远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央青委机关，它在大砭沟口（大砭沟被当地人不雅地叫做“大便沟”）我到达延安时 它又有一个颇为时髦和文雅的名称“文化沟”）同别的许多机关相比 可以说是离城最近的地方之一——在北门外二三公里的地方。司机知道我的目的地 到大砭沟口就停车 让我先下车。这条沟相当长 大概有三四公里以上。沟口朝东，在延水西侧。在沟口的西北角 有一排窑洞和盖起来的房子 有的朝南 有的朝东 对着沟口就是延水。这就是中央青委机关的所在地。

车到延安是午后 但不晚。安顿后与青委的人见了面 吃完晚饭天还很亮，正是下山到延水边散步的时候。记不起青委的哪位同志陪我下到延水的河边。这时候，河边已有不少人在散步 三三两两 男男女女 大都很年轻 一边散步一边唱歌。我感觉是到了一个大学的校园，而且比校园里的气氛更

融洽。

那一天在延河边人们唱的歌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沙漠像黄的海洋……蒙古包似起伏的小岛，骆驼在那里荡漾……”那支歌我一直没有学会。歌并不特别好听，意思也不深，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记得那么深。

散步回来，回到窑洞入睡以前我一直回味着延河边的感受。

我一下子变得非常喜欢延安。

这是我到革命圣地延安第一个白天的感受。

39·03 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第一夜

下面我讲一段煞风景的故事。本来我不该在写了我在延河边得到那样美妙的感受——在这里我使用“美妙”两字一点也不过分——之后，再讲这么一段。但是既然现在我讲自己第一天到延安的真实印象，似乎就不能不写也是在这一天体会到的、使我感到不那么愉快的经历了。

看过《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册的读者也许记得我将要离开粤北翁源那两个晚上的故事。我讲那一段故事时用的题目是《两个晚上 天上地下》。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那两个晚上（一个是1939年2月18日阴历年三十晚上，一个是同年19日阴历大年初一晚上）的反差有多么之大。现在我讲的这段故事也是1939年的事情，相隔不到半年。不是两个晚上，而是同一天的白天和晚上，可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说起来真可笑。请允许我从从容容地来讲这个可笑的故事。

我是城里人 而且是一直在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人 我虽然知道应该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 但是因为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长，对农村里的许多事情还是不很了解，尤其是北方的农村。我虽然知道有一种名叫跳蚤的会咬人的小虫，也曾经偶然被跳蚤咬过，可是印象很浅。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我曾到粤北翁源农村住了几个月。翁源与珠江三角洲相比经济上落后，但是和陕北相比就强多了。同时两地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很不一样 在翁源就没有被跳蚤咬过。我没有在西北黄土高原住过 从西安到延安这几天 我们又一直在大卡车上面露天休息，在没有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前，不敢也没有下车到友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家里过夜。进入边区路过洛川、富县、甘泉 因为大家一心想早一点到延安 也没有下车住群众家里 仍旧没有接触到跳蚤。在我到达延安的那天晚上也是我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第一晚 大概这个地方有适合跳蚤生长的条件 这一晚我就完全意外地跟跳蚤干上了。

事隔六十多年 那一晚的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 在延河边散步后非常愉快地回到青委机关时 见到了老朋友李昌 那时他是中央青委组织部长。我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可是我日夜兼程 在汽车上颠簸了许多里路 十分疲劳 很想睡一个好觉，于是我就约他第二天聊天，自己早早回到青委的同志们为我